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 叶君健：别传新声于异邦

徐从辉

今年是作家、翻译家叶君健诞辰110周年。从1938年任职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到1944年赴英宣传中国人民抗日事迹，再到1951年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对外文学刊物《中国文学》，叶君健投身对外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他通晓英、意、法、德、丹麦、世界语等多种语言，一生为世人留下了500多万字作品和300多万字译作，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为几代中国读者提供了心灵滋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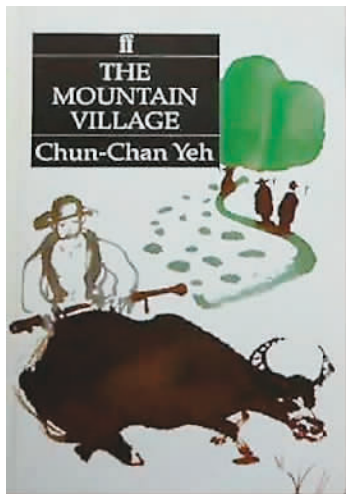
20世纪初，家国危机促使人们寻求变革，“别求新声于异邦”，造就了蔚为壮观的出国潮。在20世纪40年代的旅英者中，叶君健是杰出的一员。他不仅“求”新声，更别“传”新声，以独特的抗战演讲与革命书写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考察这一时期叶君健在英国的中国叙事与跨语际实践，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他浓浓的家国情怀。

## 在英发表抗战演讲600余次

1944年10月，叶君健通过英国牛津大学道兹教授介绍，应英国战时宣传部邀请，赴英宣传同盟国中国的抗日斗争，鼓舞英国民众抗击法西斯的士气。2022年新出版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记载，叶君健“每周约三星期在外，演讲及参观。一星期回伦敦休息。”（1944年10月12日）“中午在香港楼请叶吃饭。叶昨天方回。这次在外面两个多星期，演讲了四十多次，至少每天两次，有时三次。听众亦二三百人，多的人千以上。每次演讲及讨论至少二小时。有些人跟了他跑，他到某处去讲，他们即去听。”（1944年11月14日）“十二时半，滢与格温，布斯夫人等去China Institute。今日讲‘今日中国’，讲的是中国抗战时的人民生活。”（1945年1月17日）

叶君健是陈西滢的学生，从后者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叶君健在英国公共演讲之勤。他的演讲以中国人民的战时生活为中心，包括中国的人民武装如何拖住日本侵略者。

1942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中英成为同盟，但英国社会对中国并不了解。1943年12月17日，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参观英国考文垂菲儿新村的一所小学时，正值上地理课，同行的温源宁问一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学生：中国的首都在哪里？学生回



《山村》书影。

上世纪30年代茅盾《子夜》和巴金《家》的先后出版，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长篇小说代有佳作，并成为当下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文体之一。《子夜》《骆驼祥子》《呼兰河传》《创业史》《山乡巨变》《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秦腔》《花腔》《江南三部曲》等作品，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表达经验。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进入高峰期，表现出“外”与“内”并重的文体追求。

所谓“外”指的是长篇小说发挥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书写民族历史等方面的天然优势，注重思想容量。小说家之所以竟写长篇小说，且将长篇小说作为检验自己创作水准的标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长篇小说考验小说家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能力。其中又以家族小说最为突出，许多作家选择将历史风云、时代变迁融入家族叙事中进行表达。由于有许多经典之作可资效仿，后来的写作者选择写家族小说，貌似降低了写作难度，但这种“在文学史”上的写作，事实上对有着写作理想与雄心的小小说家而言，反而更需要通过对文学传统强大的化解、综合和转换能力，寻找创新的突破口。以此观察和衡量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力作，王跃文的《家山》和胡学文的《有生》无疑是家族小说延长线上的重要收获。

《家山》其实是一部文学意义上的

答：“日本。”王云五感慨：“此固不能谓一般小学生之常识如是，惟英国学校向来对东方不甚注意，可于此见之。”虽然20世纪上半叶，狄金森、燕卜苏、罗素、阿瑟·韦利等英国文人表现出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高度尊重，但此时多数英国民众对中国所知甚少，有的认识还停留在古代。

为扭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向英国社会宣讲中国抗战现状、促进中英文化交流，叶君健深入学校、工厂、兵营、医院，在英国各地发表抗战演讲600余次。这既鼓舞了英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志，又大大改观了英国人对中国的认知。

## 用创作与翻译传递革命声音

除了在英国进行巡回演讲，叶君健还不断通过英文创作与翻译向世界传递中国革命的声音。二战结束后，他以研究员身份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西方文学，其间用英语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山村》等作品。1947年由英国西尔文出版社发行的《山村》以叶君健故乡、具有“将军县”之称的湖北红安县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湖北偏远山村的故事。作品以第一人称“我”（春生），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视角，呈现了20世纪20年代闭塞山村底层人民的生存现实，打捞出被大历史湮没的凡人悲欢，揭示了中国民众如何一步一步走向革命道路。

《山村》被英国笔会选为1947年最佳小说，后来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冰岛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霍尔杜尔·拉克斯奈斯评价说，《山村》揭示了一个“超级庞大的国家里的革命在农村中如何开展。”《山村》挪威译者汉斯·海堡说：“我一直在寻找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默默无闻的普通人，那些在大众中活动但不一定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或英雄气质的普通人，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那些代表中国、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普通人。最终，我在《山村》这部小说中找到了他们。在阅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似乎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关于中国人的某些真实和诚挚的东西。”这些对《山村》的评价凸显出小说的文学价值与革命意义。

《山村》是叶君健《寂静的群山》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他庞大的海外文化传播工作中的一部分。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叶君健就在香港主编英



叶君健（右）与挪威剧作家、《山村》挪威译者汉斯·海堡在一起。

文刊物《中国作家》，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战文学。他还在1939年率先将毛泽东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译成英文在马德里出版，及时向海外传播中国革命理论。

1944年至1949年旅英期间，除《山村》外，叶君健还把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以及张天翼、姚雪垠、刘白羽等人的作品组成一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翻译为《三季故事集》，1946年由伦敦斯达波斯出版社出版，被外国评论家视为世界上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品集。新中国成立后，叶君健担任英文版《中国文学》主编长达25年，向世界推广解放区文学，这对世界了解中国革命文学与中国革命功不可没。

叶君健对中国抗战不遗余力的传播和对中国革命的思考来自其坚定的和平主义信念。叶君健出生于湖北农村，家境清贫，屡遭变故，早年便创作了《岁暮》《被遗忘的人们》，表达对底层人民的关注。1936年7月，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叶君健东渡日本，不久便加入日本世界语协会，为世界语“世界和平”“人类理解”的理想所吸引，希望以此表现受压迫民族与阶层的生活与思想。叶君健在1936年11月29日给自己的老师朱利安·贝尔的信中谈到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不久的将来，东方将经历巨变。我认为我必须参与即将到来的大战，否则我就太自私了。如果法西斯控制了整个世界，我们就无能为力了，法西斯破坏一切文化。”回国后，他便参加了由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的国际宣传工作，接待来华作战的国际友人。同时参与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 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叶君健在英国社会对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传播得益于世界形势及中英两国关系的转变，更离不开他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抵达英国后，风华正茂、谈吐不凡的叶君健，很快敲开了英国文化界

的大门。旅英期间，他与朱利安的母亲瓦内萨、弟弟昆汀·贝尔等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的成员有较多交往，被称为“布鲁姆斯伯里学派中的一个中国人”，并被英国文豪普里斯特利称为“我家里的中国人”。

抗战胜利后，叶君健所在的国王学院正是朱利安的母亲，这所由英王亨利六世于1441年建立的学院是剑桥大学30多个学院中最著名的学院之一，拥有大批造诣非凡的学者，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这里也走出了徐志摩、萧乾、温源宁、黄佐临等中国著名作家与学者。

1982年，叶君健再次访问剑桥，就“中国当代文学”与“英国文学在中国”做了两次精彩演讲。前者以时间为经，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为纬，梳理了当代文学的性质、与现代文学的联系、发展历程与趋势，穿插了对重大文学事件与历史事件的思考，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系统性总结，体现出一个高屋建瓴的批评家所具有的风范。后者同样以时间为序，讲述了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从清末民初严复与林纾的翻译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艺界对英国现代戏剧艺术和音乐的关注，肯定了英国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

叶君健此次访问剑桥也会见了一些老朋友，包括“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作家普里斯特利一家，老朋友李约瑟、瓦尔特·亚伦等人。其中有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人是特里克·韦金逊教授。当年，叶君健初到国王学院时，是韦金逊接待了他。现在又是韦金逊在国王学院的保留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了他。只是此时的他头发稀疏，腿脚也不灵便了。两人心里不由感叹，这一别就是37年。

叶君健等旅英现代作家，以戏剧、绘画、写作、报道等不同形式为祖国发声，在中英文化交流方面进行了富于韧性的跨语际实践。在中国文学与文化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当下，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别传新声于异邦的先行者。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本文配图由作者提供）

作家李恒昌近年来以母亲黄河为对象，致力于“大河系列”创作，先后完成纪实文学《大河安澜》《大河涅槃》等作品，最近又推出长篇小说《大河赤子》（山东友谊出版社）。这部现实主义小说，最大的特点是艺术地讲述了黄河岸边的中国故事，为大河治理的英雄人物树碑立传。

——读李恒昌《大河赤子》  
赵德发

## 为治河英雄立传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哺育了一代代炎黄子孙，孕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然而，黄河所带来的洪灾，也曾让无数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大河安澜，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梦想，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正确决策，沿黄干部群众戮力同心，才让这个梦想终成现实。《大河赤子》正是聚焦于“人民治黄”伟业。作品深情抒写黄河之子张五魁，讲述了他在带领一班人在渤海莱州湾发现M2无潮点，巧用海动力输沙入海，成功“锁定”黄河入海口，确保渤海市和利华油田安全发展的故事。阅读作品的过程，也是大河治理不断“解谜”的过程。譬如，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为何会有一个静若止水的“无潮点”？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百年大槐树如何得到有效保护？原来经常迁徙变化没有“家”的黄河口，怎样才能有一个长久稳定的“家”？黄河滩区迁建为何一定要改变原来的“房舍”，筑一个“大村舍”？这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在长篇小说《大河赤子》中都能找到答案。透过这一作品，读者可以窥见黄河水利部门和沿黄人民治理洪患、调水调沙、滩区迁建、脱贫攻坚的奋斗画卷。

《大河赤子》成功塑造了从地方政府、油田到基层农村的各色人物形象，他们一个个有血有肉，立体丰满，栩栩如生，既体现着黄河儿女的自身特质，又富有崭新的时代精神。尤其是主人公张五魁，这位出生于黄河岸边“掉河村”的“河之子”，在黄河哺育下成长，逐渐成为一名优秀领导干部。他那“黄河不留骂名，咱也不留骂名”的誓言，“稳不住黄河口誓不罢休”的精神，为了创新方案敢于直闯领导办公室的胆量，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黄河职工王长河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不仅是黄河抢险专家，还擅长“黄河号子”，是黄河民间文化的传人。在稳定黄河口的战场上，他身患重病依然来到现场，黄河口最终稳住了，自己却永远离开了人间。张虎林的塑造也很有特色，是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典型。他原本是槐树庄建筑队的队长，一心想着发财致富，然而，在生活的教育、大哥的引导下，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转而积极投身“黄河滩区”迁建，帮助全村人共同富裕。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担当、坚韧与智慧，感人至深。

《大河赤子》在结构上颇具匠心。作品的多条线索交叉推进，互相辉映。一是主人公带领一班人治理黄河口的线索；二是主人公逐步成长的线索；三是其家人保护百年大槐树的线索；四是推进黄河滩区迁建的线索。作者将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两大主题有机融入这几条线索之中，更有利于突出时代主题。

李恒昌对黄河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据我所知，他所在的铁道战备舟桥处，坐落在黄河北岸，承担黄河铁路大桥的保障任务。多年来，耳濡目染的黄河故事，深深感动了他，才有了他视黄河为精神家园和文学故乡的情怀，才有了“大河系列”作品的问世。



## 描绘多彩海上丝路

本报（王筱卉）纪实文学作家高洪雷新作《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选取亚欧非3大洲15个重要路标，书写季风潮汐中的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以贯穿古今的视野打量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和辐射形态，力图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作者为创作此书，历时3年多，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收集考证、实地采风、人物访谈等工作。

海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一条贸易路线，也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的道路。《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以小切口展示广阔历史空间，描绘多彩文明图景，对于展现中华文明深厚底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讲好中国故事具有积极意义。



可能止步于历史和现实之外，就像《家山》和《有生》是社会和人事的变迁史，也是人性史和心灵史。

当下长篇小说的另一创作趋势是“向内转”。以东西《回响》、艾伟《镜中》、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等作品为代表，呈现出以工笔细描人物心灵内面，以测绘人性深度为旨归的创作倾向。从文学史角度看，写内心（心灵）生活，是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传统，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式写作，以张炜、韩少功、史铁生、陈染等为代表的小说家，用《柏慧》《马桥词典》《务虚笔记》《私人生活》等，或直接书写个人精神生活和心灵史，或以个人思考结撰历史与现实。

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家向这一传统回归，并表现出新特点。比如，艾伟的《镜中》致敬博尔赫斯的迷宫，结构设计借鉴建筑学知识，先锋小说延长时间上的创新之作。主人公庄润生是所有人的一面镜子，一面照见众生与万物的心灵之镜。东西的《回响》挖掘当代城市人的心灵症候，具备侦探小说冷静的洞察力。有意思的是，长篇小说“向内转”更可能是小说术上的回归。因为写内心，绕不开内心独白和精神分析的技术支撑。这些写作技巧，既是19世纪末现代小说转型时刻的标志，至今仍依旧是小说家安身立命的技与艺。（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百家谈

### 长篇小说“内与外”并重的文体追求

朱婧

“中国家谱”。小说的诸多人物编织出湘西沙湾陈姓盘根错节的家族世系。除了尾声，《家山》的小说时间从1927年至1949年，共22年。这在动辄绵延百年的长篇家族小说中并不算长。《家山》关注的是“常”与“变”的问题，叙写的是家史和家常，又借由家史进入到一些现代中国的文化议题中，比如现代文明和革命如何进入并改造地方。不仅如此，《家山》的写作再次证明，我们今天虽然置身于一个全球化时代，但包含着个人情感的地方性经验的文学表达依然保有丰沛的艺术活力。

胡学文的《有生》是另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长篇家族小说。这个庞大的家族由“祖母”接生的上万名新生儿组成。《有生》写乡村女性“祖母”乔大梅漫长的一生，也写“她的家族”村庄的广袤。《有生》封面主题语是“百年中国的生命秘史”。“秘史”叙事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关联性，最有影响的当属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扉页引述

巴尔扎克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对应的是正史，对陈忠实等作家而言，秘史不是解密揭黑，而是触发小说能量的机关——解放正史未能言说的世界及其人性之幽微。《有生》的“生命秘史”以“祖母”追忆似水年华式的“伞状”结构，有效地改造了既往百年家族长篇小说叙事逻辑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依赖。而且，《有生》之史诗性，以诗性诗化解史的板正，复活文学叙事的活力。在小说的象征层面上，“祖母”和接生隐含民族原创初生神话原型，作为一部百年乡土长史，虽写芸芸众生之事，内嵌的却是中国人对生命哲学的思考。

《家山》和《有生》的文学实践揭示了长篇小说承担风俗史和民族志的功能，以及关注社会转型和人事变迁的特质。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意识到长篇小说的“外”与“内”并非完全割裂，在铺陈历史和现实辽阔文学疆域的同时，长篇小说同样可以烛照和抵达内心世界的幽微。当然，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不